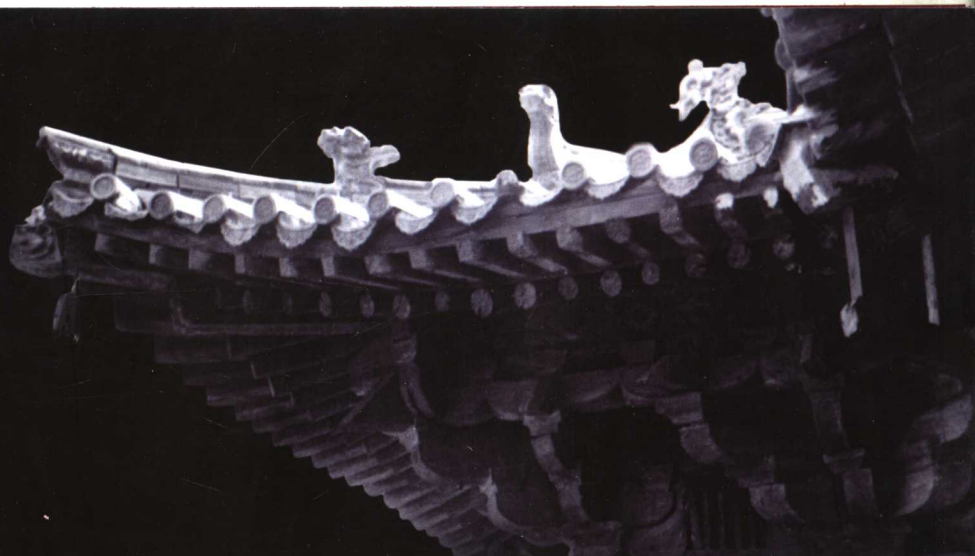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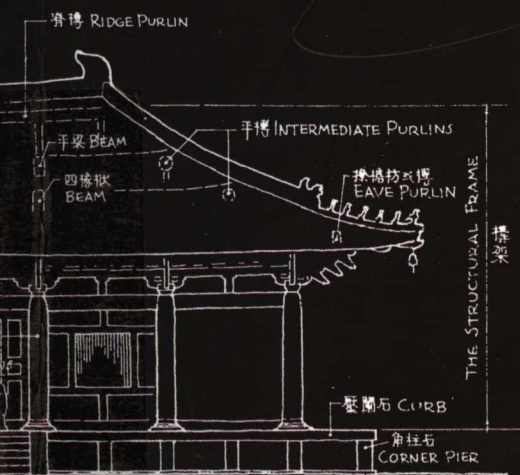


中國

營造學社史畧

林洙◎著

王世襄題



A CHINESE BUILDING

俗名稱意



百花文藝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U-242/1

2008



朱启铃



梁思成



刘敦桢



林徽因



刘致平



莫宗江



陈明达

林洙。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 林洙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306-4831-5

I. 中… II. 林… III. 建筑业—研究机构—历史—中国—
民国 IV. TU-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320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75 插页5 字数 219 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序

汪 坦

读了林洙关于朱启铃先生与中国营造学社的述作，感触万分。我生年较晚，未及见桂辛先生，然而学社初期卓越成就早已深铭心中。中央大学同学郑孝燮、朱畅中先后获得桂辛奖学金，我等遂亦略知桂老事迹。学社学术带头人梁思成、刘敦桢先生更为青年学人所敬仰。桂老与中国营造学社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功绩，永垂后世，不可磨灭。在此之前，言及我国宋以前实例，必以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和法隆寺五重塔为例，其精美绝伦令人神魂系之，然而不禁随之怅然！这种遗憾，终于由前人艰苦引路，后辈奋发图强而告结束，今日已硕果累累，矗立于世，不无扬眉吐气之感！

这是来之不易的，其中甘苦很少被人称道。林洙以其多年对此热诚关注，阅读文献，走访故老，摘录梁、刘的手记，让当时情景得约略于眼前，使这种一丝不苟，锲而不舍的精神也能为后来学人所继承。这是我敢于不避非分之嫌，为此作序的缘由。

桂老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宿志，可以说不论处境如何，始终是勇往直前的。1949年前，梁、刘辗转南北，形容他们为学术研究而致“颠沛流离”，也不算过分。一时连编制都要算作属历史

语言研究所以维持工作,调查考察时,宿在大庙中,冻得用报纸夹在毛毯间取暖,饱受跳蚤臭虫之苦就不用说了。提及这些情景,我非常激动。当然,不是以跳蚤臭虫为荣,也不是一定要以苦为乐,而且今后这些可能不复存在了。但是,下乡伊始,先问食宿待遇,一餐饭要吃二小时以上,至于偷换弄巧,坐待天赐,制造精神上的伪劣商品,不是也时有所传嘛!谦虚既不是美德,打肿脸充胖子也不值得推广。相比之下,还是宣扬一下艰苦奋斗精神为是。希望林洙这本书能受到重视,广为流传。不要让“知识产权”旁落,弄得回到学社问世以前的状况,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1995年2月于清华大学

前 言

五十年代初,我刚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时,分配到《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每天接触的全是中国营造学社当年调研测绘的测稿、图纸及大量的照片。学社那些精确的测稿和科学严谨又富有艺术性的测绘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十年动乱期间,学社的这些资料被视作“封资修”毒草,有相当一部分被毁弃了,如样式雷雷发达家族的烫样模型及明器等。至于学社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文书档案和梁思成的测绘笔记也都视为“毒草”被斩草除根了。

1989~1990年间,我为写《大匠的困惑》一书需要了解梁思成在学社的活动,翻阅了学社残存的资料,但因该书要赶在梁思成诞辰九十周年前夕出版,很多问题没能深入研究就放下了。

但是,学社的工作在我脑中留下了许多问题。学社八十多位社员,我知道的仅有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吸收了那么多非建筑界人士入社?为什么这仅有十多人的研究队伍能在短期内完成那么大量的工作?如此丰硕的成果是怎么取得的?他们到底调查了哪些省、市、县?调查测绘了多少座古建筑?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组织的等等一连串的问题,不得其解。

到了1992年，我产生了对中国营造学社的业绩做全面的了解并要把它写出来的愿望。恰巧，这时《建筑师》杂志主编杨永生约我为该刊写些关于营造学社活动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并通读了《梁思成文集》、《刘敦桢文集》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对其中重要的资料做了系统的摘录和整理。至于社员的情况和朱启钤的资料，则是从其它书刊中查到的。为此，前后加起来大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查找资料。

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总算把中国营造学社从成立到结束的全过程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因为梁思成、刘敦桢都已经作古，尚健在的几位学社元老也都是七十开外的老人，许多事也难于要求他们记得那么清楚。学社的文书档案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尽管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书的不足和疏漏，在所难免。比如，书中对调查地点和建筑数量的统计，肯定尚有遗漏。我依据的是梁、刘文集和汇刊的记录，凡是未见诸文字记录的均未计入。如在学社的图片中见到梁思成测绘邢台天宁寺塔及梁、刘二人测绘北平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的照片。但在梁、刘二人的文集和汇刊中均未见记述。梁、刘二人生前都提到经学社调查过的县有二百多，但有文字记录的仅有一百九十个县。

书中所示学社调查过的市、县及古建筑，是根据梁、刘文集和汇刊公布的材料，逐项统计出来的。调查路线也是根据他们的调查报告和日记绘制的。其中晋汾地区的调查路线，还是根据费慰梅美国费正清夫人 Wilma Fairbank 六十一年前给她家人的信，整理出来的。至于书内选用的照片，因底片均遭水残，故虽做了极大的努力，质量仍不够理想。再者，由于过去照相器材缺乏，学社有一条纪律：不允许拍摄个人纪念照，有人物的照片也多半是以人作为标尺而摄的，往往只是人的背面。特别是梁、刘二位经常担任摄影师的角色，因而他们的照片特别少。书中选用的几张测稿，因原图经水残已呈黄灰色，且满布皱纹，但我仍舍不得放弃，经胡庆章反

复试验,才得到现在的效果,只好略选几张,以飨读者。

我想,有一点是可以使读者放心的,即书中涉及到的事实,都是经过反复核实的。对有关古建筑的评价也都源于梁、刘二位的原著,不敢妄加评论。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朱海北、朱文极、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单士元、罗哲文以及台湾的李乾朗、日本的佐藤重夫等各位先生的帮助。¹特别是莫宗江先生多次为我讲述学社的工作情况。汪坦教授为我审阅了全文,并为本书作序。这些使我极为感动,在此对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秦佑国教授,是本书有力的支持者,并为“营造学社研究”课题拨出经费。

我院资料室李春梅、郑竹茵两位女士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为文稿打字。大量的照片翻拍放大工作,都是胡庆章、刘为民两位同仁协助做的,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能顺利出版,要感谢台湾赵利国先生、美国费慰梅女士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他们对此书出版给予了大力赞助。

本书稿杀青后先给杨永生看过,他认为篇幅较大,还是出一本专著为好。应该说,他是这本书最早的一位支持者,并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种种努力,我要感谢他。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女儿林彤,不少难觅的参考书都是她为我查找到的。

林 洙

1995年元宵节于清华园

¹ 本文为初版时所写的“前言”。

在这一版本出版时,这些人中尚健在的有:朱海北、朱文极、罗哲文、王世襄。

目 录

001	序	汪坦
001	前言	林洙
001	第一辑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
036	第二辑	中国营造学社机构及职员
069	第三辑	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
072	第四辑	《营造法式》编修及版本
084	第五辑	开拓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道路
188	第六辑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就及影响
195	附录一	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简介
218	附录二	中国营造学社出版物目录
226	附一	郭湖生致杨永生
227	附二	林洙致郭湖生

第一辑

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

朱启铃 1872~1964, 贵州开阳人, 字桂辛, 晚年号蠖公, 人们称他桂老。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 1964年卒于北京, 享年92岁, 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社会中, 要想出污泥而不染绝非易事。所以, 对朱启铃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把他限制在一个简单而僵化的模式里。而要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介; 过去, 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视为“政客”, 但他一生的活动绝不局限于政治方面, 他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 并对髹漆、丝绣等做过深入的研究, 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他是一个多重性的人物, 所以对他的研究, 必须注意到他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他本人的多重性, 也就是近代史家称之为“方面论”及“阶段论”的观点。只有从这纵横两方面去观察他, 才能通观他的全貌。我对朱启铃先生知之甚少, 感谢朱海北先生、朱文极先生对我的热情支持, 使我得到了不少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朱本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 限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查阅更多的史料。对朱启铃先生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后人去完成。

朱启铃早年丧父, 随母寄居在外祖父家, 八岁开始读书。1884年朱的姨夫瞿鸿机¹视学浙江, 朱随母偕妹至杭州探望姨母, 住在杭州学使



青年时代的朱启铃

署。瞿见朱聪明过人,特延聘名师张石琴先生教朱习制举文,经一年多的学习,朱于举业无所成就,却对当时的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瞿经过年余的观察,发觉朱是个经世之才,难望以科举进身。果然,朱启铃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办事才能,15岁时,就能帮助办理外祖父的丧事。

1889年朱17岁时与陈崧生曾国藩次婿的过继女陈光玑成婚。婚后自立门户定居长沙定王台。陈崧生出任英法比参赞时,陈光玑随父出国,生活在巴黎,10岁后才回国。陈给朱带来了不少异国见闻。朱启铃终身坚持一夫一

妻,没有纳妾。他的子女们特别是女儿可以自由参加社交活动。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礼教影响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他较早就从陈光玑那里接受了西方社会文明的思想。

1891~1893年瞿鸿机赴四川典试,朱亦随侍左右。四川幅员广阔,学政每年两度科试,瞿须亲往各县典试,旅途又辛苦又惊险,朱乘马随从,调护瞿的起居。瞿亦注意对朱的培养,并每在他批阅案卷时,嘱朱在侧学习,晓以史乘掌故,并令朱试着批复案卷,感到他的批复颇有见地亦中肯。

这一时期,朱结交不少贤俊,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其中尤以同幕唐才常最是知交。朱的岳父留给他不少驻外时的杂记书籍,朱从这些读物中得出“西人以制造致富”的经验总结。因而认为中国也应走“以制造致富”这条路,可以说朱很早就树立了后来诸多爱国志士提倡的“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他与唐才常经常谈论,深感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强国富民”。直到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朱又佐瞿鸿机督学江苏时,还常与张劭希、杨笃生、章士钊等私购变法维新书籍,互相传习。可以说,朱的一生始终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不管他是短暂的担任蒙务局

督办,或任京师巡警厅厅丞,或任交通部总长,或任内务部总长,直到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他都没有放弃办实事、发展工业、强国富民的信念。

瞿鸿机通过在四川两年多对朱的考察,认为朱有非凡的办事才能,虽难从科举进身,但若登仕途,不难自发。因此,在1893年瞿离四川之时,出资为朱捐了一个小官。

1894年朱到泸州盐务局印签所任职,他的家属也迁居泸州。

1896年朱调管灌口水军兼救生红船事。后又调专管云阳大汤子新滩工事,这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工程。

1897年云阳工地失火,他住的草屋烧毁,但他幸免于难。

工程竣工回到家中,不久夫人陈光玃病故。由于朱在工地曾遭火灾,妻子也病故泸州,因此朱的母亲不愿再留居四川,于是东归。是年秋,朱娶续室于宝珊夫人。

1898年瞿鸿机按试苏松、太仓地区,朱又随侍左右,并随瞿进京,被朝廷引见,分发他到江苏任职,家属也迁到苏州。

1899年朱在上海出口捐局任职,又合家迁居上海。

1900年义和团起义。朱母傅太夫人病故,朱奉母灵柩回长沙。

1901年在长沙守丧。

1902年朱送姨母瞿鸿机夫人入京,这时瞿已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政务部大臣,后又任外务部尚书,地位显赫。瞿留他在京。

1902年由瞿推荐入路矿总局任职。不久奉张文达派任译学馆提调。

1903年升译学馆监督,于是全家迁来北京。



瞿鸿机朱启钤之姨夫
1850~1918 湖南长沙人
同治进士曾任外务部尚书



1906年朱启铃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

1904年经徐世昌介绍朱与袁世凯相识,识后即辞去译学馆职,候政北洋。

1905年朱赴津主持天津习艺所工程。

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廷大为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奏请设巡警部。1906年巡警部设立,经袁保荐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郎为左侍郎。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朱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后又调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

当时巡警制度,在国内尚无先例,创业艰难,从体制到各项条例的制定,均由朱亲自拟定。为首都的治安,他每天骑马巡视

京师内外,当时市政也归巡警厅管理,他开始注意北京的街衢市容。这为他日后任内务总长时,着手北京的市政建设打下了基础。同时朱创始的巡警制度也被日后全国各省市成立巡警警察机构时,奉为圭臬。

1907年瞿鸿机被清廷罢相归里,朱亦自请开缺,居长沙一年。

1908年袁推荐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徐奏调朱任蒙务局督办。朱在上任之前先赴日本考察殖民政策,次年回国深入蒙区调查,看到兴安岭以南²地区资源丰富尚未开发,因而拟定“筹蒙要策”,计划移民边区,开发地区资源,发展边区城镇,想促使人烟稀少的边区得以繁荣。经济发展了,可由地方拨款供边防军的军费,从而巩固边疆,加强国防。计划中列举应办之事二十余项,并附金融机关之组织及局务筹款办法。可惜,这项计划未能实行。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罢官,徐世昌亦调离东三省改任邮传部尚

书。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社会,朱自然也被迫辞去蒙务局职。

1910年朱到徐世昌主管的邮传部任丞参,兼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筹建山东冻口黄河桥工程。

山东冻口大桥工程,在当年是一件大事,黄河下游河床淤积了很厚的沙砾层。桥墩基础必须采用沉箱法施工。这种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最新技术,朱对这一工程自勘察设计直至施工,事无巨细,均一一亲自过问。桥墩基础施工时他亲自下到沉井中去视察土层情况,沉井中氧气不足,十分憋闷,上得岸来正在喘气,有人从旁呈上一封电报,原来是家中来电报喜,长孙朱文极降生了。

1911年袁世凯东山再起。

1911~1912年朱任京浦铁路督办。



袁世凯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 左为朱启铃 中为袁世凯

1912年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任朱为交通部总长。

1915年在内务总长任内又兼了一任交通总长。前后涉足铁道事业约五六年的时间,成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下政府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它虽不是公开的政党,却具有左右政局的势力。交通系之所以能成为一派政治力量,是因为它把持全国的路权,掌管全国路、电、邮、航四政。并设有交通银行,管理四政专款及全国汇兑,掌有一定的财权,其中又以路权最为重要。民国初年京汉、京奉、津浦三路开始运营,获利较多。铁路收入亦多流用军费、政费。同时有了路权便可以铁路为抵押向外国大量贷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北洋政府就是因为它控制住交通系,从而绝大部分经费由此而来。

1912年交通银行逐步扩展,取得国家银行的地位,交通系进而染指国家财政,呼风唤雨,左右政坛。老交通系的领袖人物有梁士诒、叶恭绰,前者总揽交行金融,后者总揽路政。任过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及董事的有:

梁士诒 曹汝霖 张 蹇 周自齐 朱启铃 陆宗輿 叶恭绰
徐世章 汪有龄 周作民 蒋邦彦 孟锡钰 任凤苞 施肇曾
方仁元 钱永铭……

这些人均与朱有交往,其中:

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周作民、孟锡钰、任凤苞、钱永铭等后来都是学社社员,并为学社研究经费或解囊或奔走,其中尤以叶恭绰与朱关系最为深挚。

朱任交通总长时期,除已建成的京广、京奉、津浦三线外。从全局考虑计划再修筑四条主干线以贯通全国:

(一)宁湘线,自南京至长沙并延伸至贵阳。

(二)同成线,自大同到成都,使四川丰富的物资得由陆路运出,避开三峡之险。

(三)浦信线自浦口至信阳。

(四)陇海线自东海至兰州。

朱计划的这四条线是很有眼光的,也是他实现“实业救国”的基础建设。但是腐败的北洋政府,将大量的铁路经费用于军、政。这个庞大的修路计划,仅陇海线东段开工,其它均未实施。同成线自宝鸡到成都段直到五十年代才修成。

1913~1916年袁世凯任大总统职,任朱启铃为内务部总长。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六月病逝,朱亦引咎去职,移居天津。

1906~1916朱跟随徐世昌、袁世凯十年,也即是朱被后人诟病的一段历史。因此,我们也不能不认真地来对待朱的这一段历史。朱的亲友们出于对他的爱护,亦常为他开脱。如叶恭绰曾说:“袁用他,实际是把他当作瞿的人质”,朱的秘书刘宗汉先生也认为“袁对他终究是有芥蒂的,在任用中又有时把他放在最容易受伤害的地位。……如果讨袁军胜利,他自然便成祸首,而袁的嫡系亲信都得到保护。”³按这个说法似乎认为袁之用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嫡系。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均有欠妥之处。

二十世纪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已基本形成。当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机与袁的矛盾也逐步深化。清廷实际掌握军权的荣禄已被袁世凯以拜为门生等各种手段拉拢过去结为死党。袁想如法炮制拉拢瞿,先示意愿列为瞿的门生,被瞿以万不敢当却之。继之,又托人询问可否换帖,结为兄弟,瞿又婉言辞谢。袁意识到瞿不可能被他收买,因此立即警告他的死党奕劻必须把瞿赶出军机处,否则,“日后必受其害”。1907年赵启霖参奏载振,奕劻受贿丑事,举朝哗然,西太后大怒,下令查办。载、奕被袁设法包庇过关。赵启霖是军机大臣瞿的同乡,袁认为赵的参奏是受瞿的指使。因而参案一结束,袁立刻发起反击,以一万八千两银子收买御使恽毓鼎,要他参劾诬陷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清廷遂将瞿开缺,至此瞿袁之争,以瞿鸿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后人根据瞿罢相后,朱亦自请开缺为由,认为朱是瞿党无疑。在瞿倒台后,朱为瞿的政敌服务,有所非议。但笔者却有些不大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一,朱不是瞿党,至少不是瞿的死党。尽管朱在青年时期20岁就追随瞿的左右,但瞿始终没有重用他,一直就是个小官,直到1903年朱30岁由张文达之荐当了译学馆的提调,转年升监督。名声虽好听,但译学馆是个没有政权、财权、军权的清永衙门。这个差事远远涉及不到瞿袁的政争,尽管朱曾为瞿传递过文件,也仅仅是因为他和瞿有亲戚关系而已。有人根据瞿罢相后,朱自请开缺为由,认定朱是瞿的人,这个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在封建社会,仅仅因为是同乡,亲戚而受株连是常见的。朱当

时任京师巡警厅厅丞，这么重要的职务很可能被清廷视为瞿“阴结外援”的一份子，因而他自请开缺，这只能说明朱是很有头脑的聪明人。尽管瞿朱在政治上没有很深的瓜葛，但瞿毕竟是最早提携他的人，因而朱在瞿失败后，暂时退出政坛，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认为袁用朱是把朱当作瞿的人质的说法，更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朱并非瞿的子或孙，也不是养子，从《朱启钤自撰年谱》来看，朱瞿的关系与感情并没有深到能当瞿的人质的地位。

二，对袁世凯为人的阴险毒辣及政治上的卑鄙诡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逐渐被人们认识的，特别是他直接指使的几起重大谋杀案，只有在他死后才可能被彻底揭露。

我们且看看二十世纪初袁世凯的表现：他编练北洋新军，被誉为懂得现代兵法的军事家。政治上他投机立宪，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1907年立宪运动达到高潮，他也成为立宪“急进派”，被视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还力主新学，联合张之洞两次上书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在他管辖的直隶，几年之内就办了高等学堂5所，中、初等专业学堂及习艺所133所，中学及女子学堂67所，小学校4344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86652人”⁴他还令周学熙办理实业，先后在天津创设铁工厂、考工厂、商品陈列所、国货售品所、种植园，并在各县办工厂分厂，设直隶工艺局。1906年又开办滦州煤矿公司，扩大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⁵袁的这些赫赫政绩，不仅外国人对“刮目相看”甚至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也被他所蒙蔽。瞿袁相比，自然袁比瞿更能讨好世人，更能吸引朱启钤这个胸有大志，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并与朱的“以制造致富”的想法相一致。

三，袁世凯是个重才、识才且会用才的人。在徐世昌把朱推荐给袁时，袁肯定已通过他的情报网对朱进行调查并已对他有个基本的估计。否则，袁不可能仅仅为了表现自己的“雍容大度”而重用他。1904年冬，徐正式向袁引见了朱，这次见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互相赏识。这在1936年朱写的《朱启钤自撰年谱》中可以看到。1936年袁已去世二十年，按说朱对袁已无任何顾忌，但朱仍在年谱中写上“光绪三十年……冬以天津徐公之荐，受项城袁公知”。这里朱用了一个“知”字，这就说明了朱袁会晤的性质及对朱的重要性。这一个“知”字也概括了朱与袁的